

王香喜说：我们要想同不拿枪的阶级敌人作斗争，就得更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斗垮一切牛鬼蛇神，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毛泽东

这几个月来，我国文化学术战线上从批判吴晗反对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开始，到目前揭开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黑店的批判，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两种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革命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在这场大斗争中，全国许多报刊先后跃起，生龙勃，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发表批判文章，来清除毒草。这是一件值得人们欢欣鼓舞的大好事。

但是，现在已经揭露出来的《前线》《北京日报》等报刊，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斗争中，却以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百般抗拒着这个斗争的开展。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人民群众正在同声斥责“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等人反对社会主义罪行时候，象《前线》《北京日报》那样，一向积极地为“三家村”黑帮分子效劳服务的《北京文艺》，却也不吭一声。

大家知道，吴晗为古稀老人姜文父子被“罢官”鸣不平，鼓励他们“失去了两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海瑞罢官》，就是在《北京文艺》“破门而出”的。

想当年，这棵大毒草出笼之时何等热闹！《北京文艺》的编辑给它加了醒目的黑体标题，还对剧本的作者前言破例用五个大字印出，这种字在当时这个刊物上只是给个别重要文件用的。由此可以看出《北京文艺》的编辑是可等积极地为此反革命的叛乱历史翻老账了。

接着，这个刊物又推出了邓允建即邓绍基的《评〈海瑞罢官〉》和曲六石的《羞为甘荪刺 敢做南包公》两篇文章，对这场反动历史剧作了狂热的吹捧和支持。说什么吴晗是“一位善于历史研究 and 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现在“他为了开辟了一条伟大的历史研究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吴晗”从历史主义出发，写出了历史的真实”，又说毛泽东“在客观上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给统治阶级造成一些‘难堪’”啊！他们千方百计要吴晗登上“借古讽今”的高地，并且特别点了“海瑞罢官”一剧中的“羞了”的结尾，是“深刻丰富的意味”，“要了”的结尾，是“深刻丰富的意味”，“要了”“羞完之后”，去“回味咀嚼”，等等①。

这一切，同当时《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发表的那些“称兄道弟”欢呼《海瑞罢官》“破门而出”的文章，相互呼应，汇成了反对反社会主义的合奏曲。

《北京文艺》在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读者是一目了然的。这个刊物已经为资产阶级所占领，成为他们放毒的阵地了！

广大读者中牢牢记住了这一笔账！

现在，当无产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攻之后，《北京文艺》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批判“三家村”的“先锋”吴晗了吗？他们从真批判已支持这些黑帮分子反对社会主义的丑恶行为了吗？如果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过，也有点“冤

枉”。他们的确也很“积极”！不过他们是在积极地给吴晗打掩护，积极地对革命的批判进行抵制！

不信，请看下面的事实。

去年十二月号的《北京文艺》上，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是编辑在转载这篇文章的时候，却加了一个很“巧妙”的“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编者按”说：“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对于这个剧本及其评论，既然有不同意见，应当深入地进行讨论”。你看，编者装出一副多么客观、公正、中立，然而却是彻头彻尾的虚伪面孔！他们根本回避《海瑞罢官》是不是毒草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同意姚文元同志文章中的结论。其二，他们要讨论些什么问题呢？“我们认为，我们希望就《海瑞罢官》及其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重点号我们加的）。在这里，编者的真实意图完全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要“讨论”定一个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调子！

这里让我们再看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时所加的“编者按”吧。原文这样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出影响较大的戏。……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它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的意见应展开讨论。……为了便于大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我们准备在本报就《海瑞罢官》及其它有关的问题讨论。”

大家看，《北京文艺》转载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时加的“编者按”，与《北京日报》转载这篇文章时加的“编者按”的口气是多么“相称”啊！这就是：只谈学术，不讲政治；只是一般地讨论讨论，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对反党分子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揭露。

难道它们这是偶然的吗？它们为什么这样一鼻孔出气呢？

事实上，它们都是遵照“三家村”黑店邓拓们“指示”办事的。在邓拓召开的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上，就曾反复强调这次大论战是“学术问题，必须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事”，要人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处”，“要避免连累累，千篇一律”，对《海瑞罢官》“不要加大帽子，要用平实的语气，探讨的语气”②。等等。

事情不是这样的吗？《北京日报》、《北京文艺》正是按照这个“三家村”黑店邓拓所“指示”的“原则标准”来进行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的。

这是一场将彻底冲垮他们的“急风暴雨”！

第三、配合“三家村”，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发表了大批小说、戏剧、曲艺、诗歌、美术作品，特别是数量、质量“都很高”的评论。这些作品很多是借古讽今，歪曲现实，直接攻击，攻击社会主义；有的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毛泽东思想；有的是吹捧王将相，才子佳人，有的是宣扬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艺术趣味。这些毒草简直充塞了《北京文艺》，仅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就数以百计。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北京文艺》的总方针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它确实是“三家村”合伙公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尽管它同时发表一些工农兵的作品来打掩护，但是它也是改变不了这个充满黑店的黑店性质。

掩护“三家村”反兵

从一九六一年九月起，“三家村”开始反兵。真是一无独有偶，在一系列部队“好戏”中，《北京文艺》又扮演了和《前线》、《北京晚报》一样的角色。

第一步：掩护廖沫沙退却

一九六五年三月号，《北京文艺》转载黎澍即廖沫沙的《有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说：《北京文艺》过去发表的《锦上添花》（李慧敏）应该要批判。文章中，“吹捧和颂扬了孟超新编历史剧《李慧敏》的鬼戏，散布并宣扬了‘有鬼无害’的荒谬观点。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

这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承认“李慧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了，但反对转载“李慧敏”的毒草如解玉之流的文章，却根本不去指出其反对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编者按语说：《有鬼无害论》就是宣扬了“有鬼无害”的观点。这种同义语的重复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有鬼无害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确是“有鬼无害”这一观点的错误吗？于是这篇文章，真的编者按语中是含糊其词说请去“请读者阅读”了。你们转载了，当然是请读者阅读，可是仅仅“阅读”就够了吗？要不要去分析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鬼讨”呢？《北京文艺》发表此文的主要作用，是掩护

这说明，不但《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成了“三家村”反对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连北京市这个仅有的文艺刊物——《北京文艺》的“感情”上也已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三家村”黑帮分子邓拓们反党集团的工具了！

“欲盖弥彰”！《北京文艺》妄图以讨论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来蒙蔽和欺骗读者，以为只要挂上了个“讨论”的招牌，读者就不会查难他们了，就会认为他们也参加到文化革命的行列里来了，而他们的这些别有用心行径，特别是他们的企图欺骗读者的“编者按”，充分地自我暴露出来了！

因为，谁都看得清楚，《北京文艺》“编者按”中指出的对《海瑞罢官》进行讨论时只谈文艺、不谈政治的鬼花招，是充完无谓的“三家村”黑帮分子编造出来的要案！

我们要问《北京文艺》的编者：《海瑞罢官》的主要问题是在政治方面，而你们发表的吹捧文章也恰恰是着眼于“借古讽今”的政治方面，当时你们要人们“回味和咀嚼”的，正是那“罢官”的结果；如今要“讨论”了，你们为什么一开始就抵制这样一个“只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的框框呢？”

说穿了，这不过是按照“三家村”黑店邓拓的罪恶阴谋，为“三家村”“先锋”吴晗打掩护的手法：回避政治问题，把讨论引到歧路上去！

《北京文艺》其所以这样好乖乖地听从“三家村”，特别是他们的黑店邓拓的“旨意”，来玩弄这种手法的目的，不但是要让吴晗滑过去，而且也想自己在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中，可以蒙混过关，滑了过去！

这几个月来，《北京文艺》的确是以此他们的“编者按”为“纲”来安排“讨论”的。从这个“编者按”发表以来，半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对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已日益深入，对吴晗的批判历史剧、写文艺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的揭发也越来越多，甚至连邓拓、廖沫沙、吴晗合伙开的“三家村”三家黑店都被人家搞了，公诸于众了。《北京文艺》大概觉得在这里没有什么“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吧，所以在此期间，除了今年一月号登了方新诗“讨论”文外，直到今年再没有有什么动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文艺》一月号上刊有的四篇“讨论”文章，不但是三篇一般的所谓“讨论”文外，还有一篇为吴晗撰写的长文，都是恰恰符合上述“编者按”的“基本精神”的。

这就是：根本回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而一味在“清官”问题和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上大作文章。其中特别是那一篇署名志敏的为吴晗撰写的反面文章，恶

毒地对姚文元同志进行了反扑，极力为海瑞这一形象的“完美”“高大”喝采，狂热地为吴晗招徕这个“清官”身上“丰富”而“充沛”的“感情”叫好。说什么吴晗写海瑞这个人物完全“合情合理”“无可非议”，“符合历史真实”，并且别有用心地暗示：吴晗是“要让形象本身来说话，来显示某种倾向性”。在许多同志一致地指出吴晗在《海瑞罢官》中所写的“海瑞”实际上是充完机会主义分子的身份，是假海瑞的时候，那篇文章的作者却坚持“海瑞就是‘这一个’海瑞”。

人们不难看出，《北京文艺》的编者是怎样按照自己的反动意图和口味来组织“讨论”的。编者处心积虑地造了这几篇文章发表，美其名为“讨论”，实际上是替“三家村”黑帮分子吴晗开炮，打掩护。这篇反面文章，实际上正是完全按照《北京文艺》编者按语的意图来写的。

人们也不难看出，《北京文艺》的所作所为，就是在在这场论战中唱反调，是在对抗这次大批判，是挖空心思来反对这次文化大革命！

《北京文艺》对反毒草是那样积极，那样兴致勃勃，而对于除毒草却是那样消极，这样百般抵制！把这两种情况、两种态度对照起来，这个刊物是掌握在谁手里，成为了谁的工具，是为谁服务，是不十分明白的吗？

应当指出，《北京文艺》这几年来的大大小小的毒草决不止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前几年，它还发表了黄秋耘的《借诗来还家》。这三篇恶毒的借古讽今的大毒草，它借诗人杜甫的故事，别有用心地影射现实，恶毒地反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它把杜甫回家的一路情景，写成“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作者含沙射影地借一个老头子对杜甫说：“你当官受禄的，可真要给我们老百姓想办法啊！……可真要记念我们老百姓的冤屈啊！”这什么“这些年来……吏治腐败，……恶果深重中，腐败黑暗，社会黑暗，人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生产一天比一天衰落，他老人家在故里，一点儿也不比，终于闹出，他老人家‘起来’来，……”这株为“纪念杜甫”而发表的借古讽今指骂恶毒的毒草，也被编辑在《北京文艺》第一篇的显著地位刊了出来，只是在发表前其他报刊开展批判时，被迫无奈地发表了一篇好评文章。这个刊物还肆意歪曲地篡改了方新诗，极力吹捧另一棵大毒草（李慧敏），把这篇吹捧看作是“锦上添花”之作。特别是在以《“清官”名字写的文章》中，认为孟超改编的这出戏“从写人物性格变为写天下事”，“抓住政治这条主线很好”，“改编本是创造性的”。

《北京文艺》还发表文章，极力为鬼戏辩护。说什么历史虽然有害，但是，并不等于宣扬鬼魂。他们甚至认为这种文章也算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方面。直到后来，各报

现“这样的好教皇、好地主、好老舍实在是太多了，坏一个就是朱元璋”作者似乎是要通过论证朱元璋这个更大的“好教皇”也是一样得到人民拥护，从而反证实“鬼魂”这个“教皇”也和其它地主阶级教皇一样，是封建地主阶级专制的工具。可是看来看，不然，紧接着文章引用了一大串史料，说朱元璋如何“整顿纪纲”要“恤民”，说“他不但这样说，而且雷厉风行，认真办了很多事”，还说“明朝历史上能大执行朱元璋这些政治经济政策，还有明成祖、仁宗、宣宗好几个皇帝”。文章引了这一大段话之后，丝毫不分析批判，辨别真假，实际上是说：尽管朱元璋是封建皇帝，他对人民还算不错，他对老百姓还算不错，这也证明海瑞能为人民办好事，还就大张旗鼓地封建了毒草。如果是这样，那末吴晗写《海瑞罢官》又有什么用呢？

作者从提出反对写《海瑞罢官》的架子开始，终于落到了这种地步：不仅“灌输阶级理论和”，而且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证据。这还不明显吗？再看文中两段话：他们说以历史上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宋徽宗等等这些皇帝，以及他们的一帮奸臣，他们的种种改良措施，能在不程度上给人民带来一定利益”；“朱元璋等初初期的一些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活动，还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请问，这是什么话？！这是《北京文艺》推出来的指路牌，这是折衷主义的应声虫！特别可恶之还在于文前明标是工人作者，让作者以工人阶级“一点”的身份出现，以此来为吴晗、邓拓救驾。我们说，这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声音，不能代表工人阶级说话！请问《北京文艺》编辑部，你们发表这篇文章的用心何在？另外两篇文章的观点，与上一篇文章大同小异。至于志敏的《海瑞就是“这一个”海瑞》，更是避开政治问题，明显地为《海瑞罢官》辩护的。这些就是《北京文艺》编者按里所说的“争鸣”吧！是谁和谁“争”呢？是“三家村”伙计以《北京文艺》作阵地，摆摆一“阵”，“唱唱”，利用一些“唱喉”，向姚文元同志和一切革命人民“争”！这是些什么“唱喉”！前三篇黑店编辑部作为“正面文章”发表的，第四篇是作为“反面文章”，费了大劲才才到的稿。试问：你们这样歪曲篡改地制造“对立”有什么好处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毒草自己出来，好得恨！我们可以毒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肥料，而《北京文艺》这样暗中为扶植毒草生长，不是故意让毒草泛滥又是什么？

发表这四篇“正面”、“反面”的文章以后，正当讨论向高潮，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北京文艺》却再也“不”争了，二、三、四三个月，连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或转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沉默，又是一边倒！

第二步：廖沫沙保不住了，转而掩护吴晗

让我们先看那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号转载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的情况吧！据编者按说，这篇文章在《齐报》发表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我们认为，姚文元同志提出的这个问题很重要”。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把此文放到刊物末一篇最不显眼的地位呢？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揭开了这场大论战的序幕，其他各报刊都把此文放到显著地位，为什么独独《北京文艺》的这篇编辑呢？想当初，你们发表《海瑞罢官》时，目录中用黑体大字标题，文前用手书大字标题，把此文放在最显眼的地位；发表给《海瑞罢官》捧场的文章，也用了醒目的标题。为什么这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北京文艺》的编辑中显得那么不重要呢？这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鲜明地表现了你们编辑部的倾向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编者按语中曲折地表达出来的思想：（一）特别指出这篇文章是《人民日报》“学术评论”专栏“转载”的，并说：“我们决定就《海瑞罢官》及其有关文艺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重点号是笔者加的，下同）。《北京文艺》力图把讨论引导到所谓“学术”和“文艺”方面去。（二）认为这个问题是属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内部问题，需要“通过辩论，弄清是非，提高思想”，而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姚文元同志提出的政治问题，却只字不提。（三）说“本刊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号发表了一篇《海瑞罢官》副题后，三月份又发表了赞扬这个剧本的《海瑞罢官》和《羞为甘荪刺 敢做南包公》。这是事实，白纸黑字，是掩不住的，但是，这些‘评论’是什么货色呢？编者按语里却不置一词。

一九六六年一月号《北京文艺》，发表了四篇“争鸣”文章。头一篇就是《这样要认真对待的》。题目倒还像样子，然而这篇文章首先指出的需要认真对待的不是《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而只是“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剧作家写了一批历史剧”，其中“有的歌颂清官”，“教育我们，封建社会并不那么坏，封建社会有好处”。文前还大加：“这是麻疯病的教育！是麻疯病调和和调和的教育！”仅此而已！然而，就连这一也写上被作者自己用事实抹掉了！接着，文章说：“打开明史一看”，发

刊广泛地展开了对鬼戏、特别是对大毒草《李慧敏》的批判。这出鬼戏实在太臭了，才迫使《北京文艺》转载了黎澍（即廖沫沙）的一篇鬼话的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并在“编者按”中空洞地承认了发表这些毒草是“严重的错误”④。此外，再也没有作什么认真的检查，而且还用“请读者阅读”这篇“自我批评”，只字不提让读者参加批判的手法，来封住读者的口。

这就是说，在《北京文艺》编者那里，只许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他们所把持的刊物上放毒，把刊物变为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猖狂地向党和人民进攻；只许放毒者用虚伪的“自我批评”继续放毒，而不许读者跟他们算账，不许读者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给予反攻，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现在，他们对持“三家村”黑帮分子的斗争，则跨前一步，玩弄手段，假借“讨论”，真心包庇，阳奉阴违，抵制批判！

无产阶级斗争的武器，无产阶级要用文艺这个武器，资产阶级也不放放弃文艺这个武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向来是异常激烈的。“三家村”黑帮集团的阴谋诡计是在《北京文艺》和其它文艺刊物，利用文艺阵地来兴无灭资，用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来代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这又一次证明我们不能十分重视文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千万不可以麻痹大意。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就尖锐地严重地批评过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这些刊物把文艺的领导，不执行兴无灭资的革命任务，却积极推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它们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作，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这个阵地对无产阶级实行进攻；它们搞毒草的批判的红旗，却树起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帜。而时至今日，毛泽东同志提出批评已过了两年，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已步步深入，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蓬勃发展，这些刊物却搞作吧，消极怠工，甚至负隅顽抗。这是绝不容忍的！

我们一定要直接反对反社会主义“三家村”黑店，要把毒草辟得的一切切，拔掉黑根，铲除阵地，要把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的红旗，插到各个批判的阵地上去！不管他们是三家村四家村，不管他们是什么“改弦离宗”、“专家余孽”，不管他们有多少“难堪”的力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搞文化战线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不使泛滥，决不收兵。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文艺》何去何从，广大读者且拭目以待！注：

- ① 《北京文艺》一九六一年一月号。
- ② 见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 ③ 见黄炎培、蔡元培等同志的揭发材料。
- ④ 《北京文艺》一九六五年二月号。

## 《北京文艺》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

尹文欣 郑友夜 汪炎 方同德 侯文正

在邓拓一伙黑帮把持北京市思想文化领导岗位的情况下，《北京文艺》、《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放了大量的毒草。他们在掩护“三家村”反兵时，又扮演了《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一样的角色。《北京文艺》是“三家村”黑店的一个分店。现在到了把《北京文艺》揪出来的时候了！是到了彻底清算邓拓一伙利用《北京文艺》所干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勾当的时候了！“三家村”的一切阵地，统统都要打垮，统统都要夺回来。

我们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年的学生，从四月十六日起临时抽到《北京文艺》编辑部帮助工作。将近一个月以来，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一些情况，联想到《北京文艺》从一九六〇年以来的整个情况，因而有很多话非说出来不可。

配合《前线》、《北京日报》和

《北京晚报》大放毒草

我们认为，《北京文艺》这几年是一个资产阶级阵地。它不是放了儿株毒草，而是放了大量毒草。这是由于失去警惕，而是在邓拓等一小撮反党分子把持北京市思想文化领导岗位的情况下，配合《前线》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一起放毒。可以说，它是“三家村”大黑店的一个分店！

事实很明显地证明了以下儿点：第一，一九六一年一月，它以黑体大字标题发表了“三家村”“急先锋”吴晗的《海瑞罢官》，为“三家村”射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第一支大毒草。可以说，《海瑞罢官》的发表，正是《北京文艺》公开起大黑旗的标志。

第二，它配合“三家村”各战战役，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毒草。一九六一年二月，“三家村”的“老兄”、“老弟”为《海瑞罢官》的发表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得意忘形，公开互相“鼓舞”的时候；三月份的《北京文艺》就发表了《评海瑞罢官》、《羞为甘荪刺 敢做南包公》两篇文章，一面巩固阵地，一面加紧进攻。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的《海瑞罢官》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更加突出地鼓吹和机会主义分子“不为强暴所屈”，更加放大地鼓吹和机会主义分子。紧接着，《北京文艺》在次年四月、六月，先后发表了有名的毒草《杜林家史》和《唐肃宗的》等与之密切配合。此外，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号，甚至直到一九六三年一月号，《北京文艺》又分别发表了三篇吹捧吴晗的文章，大肆鼓吹“鬼魂”（李慧敏），一九六二年，廖沫沙发表《怕鬼的“难堪”》，次年二月，《北京文艺》即刊出王雨林的《鬼眼》，非常忠实地贯彻了吴晗的精神。至于“三家村”的主将邓拓，自然是把“主精力”放在《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上，可也绝不会放松这块阵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份上发表的陈云《云海》（面）的讨论。这篇诗发表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以前，是一篇最露骨的黑诗。诗人从这首诗中看“主席”的风貌吧！诗云：“长，眼望无边”，“浩荡长风压九霄”，“浮云天际飘红浪”，“山千仞舒鹏展”，“仙苑三春风信近”，“巫峡花梅落”，“湘妃神女展双眉。高情应解人间事，莫问邓原作雨晴。”他展

望着“天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浮云”，赞赏什么“浩荡长空卷奇峰”；一面踌躇满志得意忘形，自信“海山初拥鹏程近”，一面又感到“仙苑三春风信近”，“形势”发表还满足不了他的迫切心情，感怀他期望的“仙苑三春”即资本主义复辟还迟迟不能到来。面对这种形势，他施展“主帅”的“法术”，呼风唤雨：“高情应解人间事，莫问邓原作雨晴。”你看他多么焦虑，多么迫切地需要一场反革命的“急风暴雨”！可情事与愿违，他盼来的是——一场将彻底冲垮他们的“急风暴雨”！

第三、配合“三家村”，千方百计地推行和平演变。发表了大批小说、戏剧、曲艺、诗歌、美术作品，特别是数量、质量“都很高”的评论。这些作品很多是借古讽今，歪曲现实，直接攻击，攻击社会主义；有的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毛泽东思想；有的是吹捧王将相，才子佳人，有的是宣扬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艺术趣味。这些毒草简直充塞了《北京文艺》，仅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就数以百计。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北京文艺》的总方针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它确实是“三家村”合伙公司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尽管它同时发表一些工农兵的作品来打掩护，但是它也是改变不了这个充满黑店的黑店性质。

掩护“三家村”反兵

从一九六一年九月起，“三家村”开始反兵。真是一无独有偶，在一系列部队“好戏”中，《北京文艺》又扮演了和《前线》、《北京晚报》一样的角色。

第一步：掩护廖沫沙退却

一九六五年三月号，《北京文艺》转载黎澍即廖沫沙的《有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并加了编者按语说：《北京文艺》过去发表的《锦上添花》（李慧敏）应该要批判。文章中，“吹捧和颂扬了孟超新编历史剧《李慧敏》的鬼戏，散布并宣扬了‘有鬼无害’的荒谬观点。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

这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承认“李慧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了，但反对转载“李慧敏”的毒草如解玉之流的文章，却根本不去指出其反对反社会主义的实质。编者按语说：《有鬼无害论》就是宣扬了“有鬼无害”的观点。这种同义语的重复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有鬼无害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确是“有鬼无害”这一观点的错误吗？于是这篇文章，真的编者按语中是含糊其词说请去“请读者阅读”了。你们转载了，当然是请读者阅读，可是仅仅“阅读”就够了吗？要不要去分析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鬼讨”呢？《北京文艺》发表此文的主要作用，是掩护

（下转第三版）









# 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太阳

## 墨西哥读者热爱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著作处处受到欢迎。这是英国公众在伦敦的一次书刊展览会上，阅读毛主席著作。 徐文亮摄（新华社稿）

中国人民贯彻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胜利

## 苏联修正主义者和美帝遭到新的失败

### 松村谦三举行告别宴会

# 中国的胜利就是柬埔寨的胜利

